



TITLE:

# 當社區居民成為難民的「共鳴者」 時: 難民接收所帶來的影響

AUTHOR(S):

瀬戸徐, 映里奈

---

CITATION:

瀬戸徐, 映里奈. 當社區居民成為難民的「共鳴者」時: 難民接收所帶來的影響. 2015年度京都大学南京大学社会学人類学若手ワークショップ 東アジア若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ワークショップ報告論文集 2016: 131-134

ISSUE DATE:

2016-06-04

URL:

<http://hdl.handle.net/2433/215795>

RIGHT:

當社區居民成為難民的「共鳴者」時  
難民接收所帶來的影響  
瀬戸徐 映里奈 (SETO-SUH Erina) \*

一、在日難民相關研究史——以印度支那難民為中心

所謂難民，是指那些生活受到威脅，為了求得更好的生活而逃出自己所屬國家，從而喪失其所屬國家保護，處在無國籍狀態的人們。難民營也好，或是「願意接收」國中的社會也罷，他們被邊緣化，且他們必須在雙重的疏離狀態中，重建自己的生活。圍繞著難民（包含不被認定為難民的庇護申請者等等）的那些法律地位以及社會地位的問題，事實上是相當複雜的。不能簡單地將他們等同於那些跨越國境的移民。是故，對於難民的研究，重點都放置在分析產生難民的社會構造，以及如何恢復並保障那些被迫離開國家庇護之外的每一個「赤裸生命」（Giorgio Agamben, 2003）的安定生活。

那麼，在日難民的研究在日本是如何進行的呢？日本不是產生難民的一方，而是作為從他國接收難民的一方，而被國際社會要求要有所應對。（本次發表雖不深入討論，但我們有必要先認知，日本也是一個在過去因為帝國的擴大與解體，在佔領地或是日本國內產生了大量的難民的當事人（市野川，2007））對於移民的接收，日本從戰後開始就採取一種非常消極的態度，而對於難民的接收也是一樣的。

日本對於印度支那難民的接收，對此帶來了很大的轉機。所謂印度支那，是指越南、寮國以及柬埔寨三個國家。1975 年 4 月，越南戰爭結束之後，這三個國家相繼誕生了新的社會主義政權。在如此巨大的社會變革當中，過去曾是彈壓對象的舊體制關係人士，或是因為經濟體制的驟變變得貧窮的人們相繼離開故鄉，搭著小型船隻等等逃向了海外。那些被救助的印度支那難民雖然寄身於日本，但當時日本僅承認他們的短期滯留，並不允許他們定居下來。這樣的態度受到了來自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的批判。到了 1979 年，日本才終於許可了他們能夠定居下來。對於印度支那難民的接收，成了日本批准難民條約、國際人權條約的契機，其他在日外國人的處境也因此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田中，1999）若說在日難民的研究，是發端於對於印度支那難民的研究，則應該也不算過分。如何與新進到日本、社區中的印度難民共處，進而達成社會的統合？以此為課題的相關研究，累積了不少成果。

在接收的初期，首先進行的研究是，摸索出一個如何有效率地建立他們生活基盤的支援方法。這些多是以日文學習等教育方面為主的研究。（西尾，1988）（福留等人，1994）至於就業輔導或是居住地等等具體的生活事宜，則始終採用現況報告。（內閣官房印度支那難民對策連絡調整會議事務局編，1989 等等）從開始接收之後經過數十年，從原有的國家所招來的家人或是配偶，以及在日本出生的第二代，讓印度支那的難民家族、地域型社會的構成愈來愈多樣化。他們所承擔的問題也變得複雜化。掌握教育現場或是社區當中，難民第二代學習支援的實際情況，並思考今後的發展，成為了針對這些他們所承擔的問題進行研究時的研究重心。（乾，2009）（大谷，2012）到了這個時期，由於相關問題與 90 年代所增加的其他新進成員所抱有的問題多有重複，故專門針對難民的研究就持續減少。但在另一方面，在社會學或是文化人類學的領域當中，則是記錄了他們身為難民的經驗，以貼近他們生活的方式展開

---

\* 京都大學農學研究所博士班

研究。因為難民也有可能返回原先的國家，故祖國或是接收國的狀況會帶給難民生活怎麼樣的影響？在那之中他們如何維持跨國的聯繫？一邊處理在日本的生活問題，是否一邊形成了地域性社區？這些問題漸漸明朗化。（川上，2001）（戶田，2001）（野上，2010）。再加上，作為印度支那的難民而渡日的越南籍難民，他們大多居住在長田地區，這個地區因為 1995 年的阪神大地震而受到嚴重的打擊。而在急難時的支援、地區的復興或是個體生活的重建當中所浮現的民族性的問題，也再度促成了處理印度支那難民問題的契機。（住村，1997）（川越，2009）

雖然有些粗略，但有關印度支那難民研究的發展可以說就是如同以上所述的那樣。然而，以日本境內的少數人口群來說，人口數不到一萬的印度支那難民，作為在日外國人而被歸類、作為難民研究而被標榜出來的情況是相對較少的。只不過，日本在 2010 年試驗性地引進第三國定住制度，接收了八十六名的緬甸難民。據此，認為這是從印度支那難民的接收中所得到的教訓的相關議論，也再度增加了。

但另一方面，日本即便接收了印度支那的難民，但在那之後，對於難民接收的消極態度並沒有因此消滅。（根據 2014 年所發表的日本難民認定人數只有十一人的這件事，也可清楚看出日本的封閉性）在這種情況下，對於一邊等待著難民認定結果，一邊在沒有法律保護的惡劣環境下生存的難民申請者的相關研究，被認為是相當重要的。（森谷，2011 等等）綜上，可以說今後也有必要在掌握複雜情勢的同時，去反映國際社會與日本社會的狀況，而展開短期以及長期的在日難民研究。

## 二、筆者截至目前為止的研究成果——在日越南「難民」

上述所謂支那難民的八成人口是從越南過來的，筆者過去曾著眼於此，以日常生活的「食」作為切入點進行調查，試圖捕捉難民生活的樣態。移居者在異文化的地方品嚐到故鄉料理的這件事，是與心靈療癒、自我認同的保持或是形成相關連的。然而，在不同的自然、社會環境下，要得到故鄉的「食物」，則需要採取與故鄉不同的作法才有辦法做到。筆者的研究著眼於那個作法，將「為了『重現』故鄉的料理，在入手食材時所產生的與社會、市場、自然環境之間的關連」定義為「入手食物之實踐」，並把它做為一種試圖捕捉其生活世界時的分析視角。筆者將越南籍住民的集中居住區域之一，兵庫縣姬路市，做為調查的對象。姬路市的這塊集中居住區域，在它近郊的工業・住宅混合區中，留有那些免於都市化命運的耕作地。此外，他們的生活環境，他們所就職的製革廠或是肉品處理廠，與群聚起來的那些被歧視的部落民區域有密切的關係。越南難民們利用這種特殊的區域性，以便宜的價格向在肉品處理廠工作的其他越南人購買平常難以入手的內臟等肉類，並且向該地區的居民借用棄耕地等等，來獲得必要的食材。換言之，吃著自家文化的食物的這種在家庭內所發生的私領域的行為，即便不介入商業行為，也能成為與該地區其他的居民之間建立起嶄新關係的契機。

透過「入手食物之實踐」的分析，使得族群網絡、與地域中其他住民之間的關係如何開展、開展時家族成員的分工如何進行等問題明朗化。研究的結果，可以說從另外的角度，補充了與社區間的居民所發生的衝突及其解決等等，這些以往重視「支援」的研究所指出的難民生活問題。

### 三、做為一名研究者與共鳴者——兼及筆者所處的位置

在進行上述的研究之時，首先筆者為了研究調查而接觸的是一位筆者從小就認識的越南女難民。兵庫縣姬路市是筆者的出生地，家父也在越南難民們同在裡頭就職的小工廠裡工作，是故從小就有不少與越南難民的大人們談話的機會。（雖說一年當中只算得上有幾次）此外，中學的時候，筆者曾經上過一位十來歲時就做為難民渡日而來的越南女數學教師的課。之所以有這種相遇的機會，是因為筆者所上的中學，與致力於印度支那難民的教會有關係，是一所具有傳教性質的私立學校。只不過，為何越南人多住在姬路市？則是當時的筆者所不會曉得的。越南人的存在是如此地理所當然，但與此同時，他們的來歷卻是無從得見的。筆者於大學時期在閱讀有關在日外國人的書之後，才第一次知道有支那難民，姬路市曾有座接收支那難民的中心，以及筆者所遇到的越南人們大多是以難民身分來到日本的這些事。筆者受到了雇用了許多以越南難民為首的在日外國人的產業的恩惠，並且受到研究所擴充化，此一社會背景的影響，才能順利升上大學／研究所。對筆者來說，這些事實帶來了衝擊。筆者之所以著手於越南難民的相關研究，是為了要自省式地去了解此一社會構造的面相。筆者也想從越南難民們的生活去思考自己在社會上的所在位置（加害以及被害）。同時，筆者也想要從少數族群所抱有的生之艱難，以及為了打破這艱難該運用地區中的哪些社會關係及資源的這點，去了解共存的方式以及程度。

之所以刻意寫出這些私人的事情，是因為筆者在進行調查的時候，重新遭遇到了那些在筆者過去只是單純經過的那些地方、家庭中生活著的人們。對於越南難民社群的調查，也讓筆者意識到過去對於自己的出生地僅有片面的了解。可以說，筆者與越南難民之間的往來是有一種必然性的，在掌握社區狀況的時候，筆者不僅遇到了越南難民跟他們的家人，還有社區中那些特意去跟那些難民往來的其他人。廣田用「共鳴者」來表現這些「比方說透過自身的生活價值或是職業上的關係等等，對於那些跨越國境而來的人們，給予某種意義上的共鳴，並且取得了共同的步調、組織人際關係網的人們」。（廣田 2003：11）筆者所遇到的這些共鳴者當中，並不是只有因為身為教師或是雇用者等等工作上的關係才不得不去面對難民的人，而有那種不把偶然的緣份視作一時性的東西，長期保持著自身的生活與難民之間的關係的人。從這些共鳴者的話語中，筆者了解到他們跟越南難民之間的相遇是怎麼一回事，並藉此考察到社區在接收難民時所感到的衝擊，以及日日所會發生的問題。這對僅僅傾向於去了解越南難民狀況的筆者來說，相當程度地啟發了筆者，讓筆者知曉社區對於他們所投向的眼光，以及這樣的眼光對於他們的一種自我認識帶來了什麼樣的影響。與此同時，筆者在進行調查當中，覺得共鳴者們比越南難民們更希望筆者成為一名共鳴者，而筆者也有意識地去參與其中。身為研究者及研究所學生的筆者，針對作為一名共鳴者具體能作些什麼的問題，並不想輕易地給出答案。只不過，在對於越南難民的支援逐漸發展的過程當中，與此相關的研究者們帶來了什麼樣的效果？對此，即便是在詢問自身位置的這層意義上也好，在筆者與共鳴者們的相遇以及啟發當中，筆者感覺到繼續將此列入研究視野之中並持續進行調查的必要。

#### 参考文献

- Agamben, Giorgio, 1998,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trans. Daniel Heller-Roaze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アガンベン、2003、『ホモ・サケル：主権権力と剥き出しの生』、高桑和巳、以文社。]
- 福留伸子・山元啓史、1993、「インドシナ難民の日本語習得の状況とその問題点(教育編)」、日本語教育方法研究会誌、pp26-27。
- 本間浩、2011、「わが国のインドシナ難民受入の経験と第三国定住受入制度の理論的諸問題」、難民研究ジャーナル(1)、pp9-28。
- 市野川容考、2007、「Ⅱ 難民とは何か」、市野川容考・小森陽一『思考のフロンティア 難民』、岩波新書、pp. 115-176。
- 乾美紀、2009、「ミニマイノリティの高校進学と教育支援に関する研究-神奈川県を中心としたラオス定住難民を事例として」多文化共生研究年報(6)、22-38。
- 川上郁雄、2001、「越境する家族 在日ベトナム系住民の生活世界」、明石書店。
- 川越道子、2009、「悶え神の政治学—大震災以降の神戸が語る戦争と越境—」、大阪大学博士論文。
- 久保忠行・岩佐光広、2011「制度批判でみえなくなること—日本の難民の第三国定住制度をめぐって—」『国際社会文化研究』第12号、pp.53-82。
- 森谷康文、2011、「エスニック・コミュニティのない難民申請者へのグループワークによる支援」、難民研究ジャーナル(1)、pp101-110。
- 内閣官房インドシナ難民対策連絡調整会議事務局編、1989、「インドシナ難民とわが国の対応」。
- 西尾珪子、1998、大和定住促進センターおよび国際救援センターにおけるインドシナ難民に対する日本事情教育)、日本語教育(65)、95-108。
- 野上恵美、2010、「在日ベトナム人宗教施設が持つ社会的意味に関する一考察：カトリック教会と仏教寺院における活動の比較」、鶴山論叢 10、41-56。
- 荻野剛史、2012、「『ベトナム難民』の『定住化』プロセス-『ベトナム難民』と『重要な他者』とのかかわりに焦点化して」、明石書店。
- 大谷杏、2012、「インドシナ難民2世、3世が抱える学習問題と学校・地域の対応」、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紀要別冊(20-2)、221-230。
- 住村欣範、1997、「ベトナム難民研究の視点—合衆国の研究事例と震災後の神戸の場合」、年報人間科学(18)、135-150。
- 田中宏、2013、「在日外国人-法の壁、心の溝 第3版」、岩波書店。
- 戸田佳子、2001、「日本のベトナム人コミュニティ—世の時代、そして今」、暁印書店。
- 広田康生、2003、「エスニシティと都市」、有信堂高文社。

(翻譯 趙偵宇)